

高阶英语学习者对线性思维特征习得的实证研究^①

王文斌 陶 衍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 要: 本文从英汉时空性思维特质差异出发,通过实验手段对以汉语为母语的高阶英语学习者在句法规则层面和思维层面上的表现进行并案考察,聚焦于其对英语线性思维特征的习得,旨在揭示二语习得最终状态中介语的思维特征。研究发现,高阶英语学习者在句法规则层面可以习得形式完备和主谓一致性这两个能体现英语线性思维特征的语言表象,并能压制母语汉语的强空间性思维,但依然未能在思维层面习得线性思维特征本身。研究结果说明,高阶英语学习者对目标语思维特征的习得仍存较大困难,而其最终状态中介语却表现出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独特性,这在二语习得的思维层面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主题词: 时空性思维; 线性思维; 回指习得; 一致性习得; 最终状态中介语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82(2020)04-0049-09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0.04.007

1 引言

目前大部分的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缺乏对思维层面的考察,然而,思维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必然体现于二语习得过程。就英汉语在思维层面的差异而言,王文斌(2013a, 2013b, 2019)提出英汉语时空性思维特质差异观。在此基础上,王文斌、陶衍(2019a; 2020)考察了英语强时间性思维特质对语言加工的影响和英汉时空性差异对中阶英语学习者的影响,发现英语母语者的强时间性思维特质,尤其是其线性思维特征,在句法规则层面主要表现为形式完备(formal completeness)和主谓一致性关系(subject-verb agreement),而具有核心地位的主谓一致性更能反映英语的线性思维特征。他们还发现,英汉语在思维特质上的差异,尤其是受母语汉语强空间性思维的直接

影响,中国中阶学习者在句法规则层面难以掌握英语的形式完备和主谓一致性,遑论对于英语线性思维特征本身的习得。由此可见,在思维层面考察二语习得的最终结果,即最终状态中介语(end-state interlanguage)^②,实有必要。本文在王文斌、陶衍(2019a; 2020)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高阶英语学习者^③,在句法规则层面以及思维层面考察其最终状态中介语对英语线性思维特征的习得,力图揭示二语习得的最终结果在思维层面的一般特点。

2 文献综述与问题

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及其思维特质往往反映于其语言表征(Humboldt, 1999: 81-87; Wierzbicka 1979: 313),民族思维与语言具有必然的关联。就英汉语而言,王文斌

作者简介: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言对比与语言教育教学、词汇语义学, E-mail: wangbode88@163.com。陶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英汉对比。

(2013a, 2013b, 2019) 提出英语具有强时间性思维特质, 而汉语则具有强空间性思维特质。在句构上, 英语的强时间性思维特质主要表现于具有明显线性思维特征的连接性和延续性, 而汉语的强空间性思维特质则主要表现于明显的块状性和离散型特征。

需要关切的是, 思维与语言的这种不可分离性, 也必然表现于二语习得。然而, 目前大多二语习得理论仅关注语言中句法规则的习得, 尚未考察思维层面。因此, 有必要区分句法规则本身的习得与思维层面的思维特征习得。语言规则往往是语言背后思维的外在表现, 而语言的思维特质无疑更具关键性。因此, 语言习得的研究视野不仅应包括在句法规则层面对语言规则的习得, 更应在思维层面关注语言规则习得受思维特征的影响乃至对思维特征本身的习得与否。思维层面的习得研究在学界虽已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王墨希、李津, 1993), 但关切度远远不足, 加强这一方面的探讨尤为重要和迫切。

其实, 就这一主题, 王文斌、陶衍(2019a)已考察英语母语者的强时间性思维对语言加工的影响, 认为强时间性思维有双重体现: 在句法规则层面, 体现为形式完备与一致性(agreement)这两种规则要求; 在思维层面, 则体现为主谓一致性具有核心地位这一语言现象。王文斌、陶衍(2020)也考察了母语思维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对这两种规则本身习得的影响, 发现以汉语为母语的中阶英语学习者在回指形式上以及主谓一致性上的表现均明显不如母语者, 可见中阶学习者的母语思维(即汉语强空间性思维)明显阻碍了其对外语规则的掌握。

然而, 在思维层面研究二语习得的一个更重要问题是, 学习者的最终状态中介语在思维层面到底有何特点, 即二语学习者最终能否完全习得与目标语一样的思维方式? 需指出的是, 王文斌、陶衍(2020)的研究对象是其中介语仍在发展过程中的中阶学习者, 聚焦于对两种规则本身的掌握, 但尚未触及已达到最终状态的高阶学习者及其对英语线性思维本身的习得这一更深层的问题^④。因此, 本文将探究以汉语为母语的高阶英语学习者对英语线性思维本身的习得^⑤。同时, 王文斌、陶衍(2019a)的发现, 即英语线性思维在句法规则层面和思维层面的体现, 可作为进一步检验以汉语为母语的高阶英语学习者对线性思

维本身习得的依据, 并由此形成以下两个具体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 在句法规则层面, 高阶学习者对英语形式完备与主谓一致性的习得结果如何? 研究问题二: 在思维层面, 高阶学习者能否同母语者一样, 将主谓一致性置于核心地位?

对于研究问题一, 即句法规则层面的习得, 一方面, 强时间性思维与强空间性思维的差异在句法规则层面的一大体现, 在于对形式完备的要求, 尤其体现于零形与非零形回指形式。汉语中, 零形回指极为常见(陈平, 1987; 许余龙, 2007; 蒋平, 2004, 2017等), 不仅如此, 其接受度在一般条件下高于非零形回指(王文斌、陶衍, 2019b), 是汉语强空间性思维的重要体现。相反, 英语句法不允许零形回指, 对其接受度远低于非零形回指, 体现了线性思维特征对形式完备的高度要求。就二语回指习得而言, 已有研究发现, 学习者在回指形式的选择使用上具有过度明确(overexplicitness)倾向(如Tomlin, 1990; Hendriks, 2003; Gullberg, 2006; Ryan, 2015等)。然而, 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范式大多是引诱产出(elicited production)方法, 所发现的现象并不能直接反映对规则知识本身的掌握, 难以检验在句法规则层面对形式完备的习得。就这一问题, 王文斌、陶衍(2020)发现,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 中阶英语学习者对形式完备的掌握受到了汉语强空间性思维的明显阻碍, 因此其表现不如英语母语者。基于此, 有以下假设以供检验: 若高阶学习者的最终状态中介语在规则层面能习得形式完备, 则必然伴随着对母语强空间性思维的压制, 这也是研究问题一所考察的内容之一。在另一方面, 英语以主谓一致性为代表的一致性系统是其强时间性线性思维的重要依赖(王文斌、陶衍, 2019a), 因此对线性思维习得的体现之一必然是学习者在规则层面对主谓一致性本身的习得。已有对词素学习的研究发现, 学习者在英语主谓一致性的掌握存在困难(如Jiang, 2004, 2007)。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实验任务本身仅关涉语义的理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试的注意力, 因此难以直接反映学习者在规则层面是否已掌握主谓一致性的语法知识。就此, 王文斌、陶衍(2020)发现中阶学习者对主谓一致性规则的敏感度明显不如英语母语者, 这与已有研究的发现一致, 但中介语已达到最终状态的高阶学习者是

否也如此,则有待探究。因此,研究问题一将进一步考察高阶学习者在规则层面对英语谓语句动词一致性的习得。在此需提及的是,主谓一致性要求主要表现于谓语句动词在人称和数上需与主语保持一致,所以本文对此简称为谓语句一致性。

对于研究问题二,需指出的是,即便能观察到高阶学习者在句法规则层面的表现无异于母语者,也依然有必要深入考察其思维层面对线性思维特征本身的习得。如上文所提,二语习得在规则层面与思维层面的区分在学界已有认识(如王墨希、李津,1993),在实践中,英语教师也往往发现让学生掌握所谓“英语思维”十分困难。因此,研究问题一是研究问题二的前提,研究问题二则是研究问题一的必要深入和拓展。英语句法中对动词的侧重(何清强、王文斌,2015)和英语线性结构对主谓一致性体系的依赖,使得谓语句动词一致性在英语线性思维中具有核心地位,其重要体现便是英语母语者对谓语句动词一致性错误较其他错误更为敏感。因此,在思维层面考察高阶学习对线性思维本身的习得必然涉及检验其是否同样将谓语句动词一致性置于核心地位。需要看到,只有对句法规则层面和思维层面这两个层面的习得进行并案考察,才能看清学习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习得英语时间性线性思维特质;也只有学习者在这两个层面都呈现出与母语者相同的表现,才能确认其掌握达到母语者水平的线性思维特征以及强时间性思维特质。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研究高阶学习者的最终状态中介语所体现的思维特点。就此,本文从以汉语为母语的高阶学习对英语线性思维特征的习得切入,在句法规则层面与思维层面对其进行并案考察。上文所言的研究问题一关涉学习者在规则层面的习得,而研究问题二则重点勘察其在多大程度上能习得英语线性思维特征,并借此揭示高阶学习者最终状态中介语在思维层面的特点,从而反映二语习得在思维层面的最终结果。

3 实验

本实验采用可接受度判断任务(acceptability judgment task),通过对比高阶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在4组实验材料中的表现回答以上两个研究问题。本实验设计了英语的零形回指材料、非零形回指材料、一

致性错误句材料和正常句材料。对比高阶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对零形回指与非零形回指材料的接受度,可检验高阶学习对形式完备的习得,而对比高阶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在一致性错误句和正常句上的表现,则可检验高阶学习对谓语句动词一致性的掌握,借以考察高阶学习者在规则层面的习得表现,从而回答研究问题一。进一步对比高阶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对零形回指材料和一致性错误句的接受度,可观察两个组别对何者更具敏感度,从而反映高阶学习者是否可像母语者一样将谓语句动词一致性置于其句法知识的核心地位,并由此体现其能否在思维层面对英语线性思维本身的习得,以此回答研究问题二。

3.1 被试

高阶学习者组的被试为北京某大学英语专业大三或大四学生,均已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并汇报已达到雅思(IELTS)7.5分以上成绩,且无任何母语阅读困难,可认为其中介语已达到最终状态。高阶学习者组被试共30人,其中男性11人,女性19人,均龄为22.13($SD=1.48$)。英语母语者组被试以英语为母语并报告尚未达到基本交流水平的二语能力,无任何母语阅读困难,教育背景都为本科及以上。母语者组被试共32人,其中男性18人,女性14人,均龄为30.56($SD=5.16$),都通过亚马逊Mechanical Turk平台招募。

3.2 实验材料

3.2.1 零形回指材料

零形回指材料由两个句段以逗号相连接构成,第一句段由作主语的名词性短语或代词、作谓语的简单过去时及物动词和作宾语的名词性短语组成,第二句段为作谓语的简单过去时be动词和副词quite及形容词组成。零形回指出现在第二句段,回指对象可指向第一句段的主语(以下简称“主零”,如句(1)所示),也可指向第一句段的宾语[以下简称“宾零”,如句(2)所示]。本实验总体上设计了主零、宾零材料各8句,平均分配给两个平衡设计的实验版本,因此单个实验版本中主零、宾零材料各有4句。

(1) The students_i got the results_k. \emptyset_i were quite sad. (主零)

(2) The students_i got the results_k. \emptyset_k were

quite disappointing. (宾零)

3.2.2 非零形回指材料

非零形回指材料与零形回指材料相应，仅在零形回指形式上采用回指对象先行语的重复。因此，非零形回指材料中回指对象也可指向主语[以下简称“主非”，如句(3)所示]和宾语[以下简称“宾非”，如句(4)所示]，两者总体上各设计了8句，平均分配给两个平衡设计的实验版本，因此单个实验版本中主非、宾非材料也各有4句。

(3) The students_i got the results_k, the students_i were quite sad. (主非)

(4) The students_i got the results_k, the results_k were quite disappointing. (宾非)

3.2.3 一致性错误句材料

一致性错误句材料细分为短句和长句，其中一致性错误均为作谓语的be动词与主语的数量信息不一致错误。一致性错误短句均为由主语和作谓语的be动词短语组成的简单句[如句(5)所示]。一致性错误长句则由主语和以连词and连接的两个谓语动词短语组成，其中第二个谓语动词为be动词，这也是一致性错误发生之处[如句(6)所示]。一致性错误句都为简单过去时或过去进行时。每个实验版本任务中均有6个一致性错误短句材料和6个一致性错误长句材料。

(5) *The animals was well treated. (一致性错误短句)

(6) *All guests arrived and was welcomed by the host. (一致性错误长句)

3.2.4 正常句材料

正常句同样细分为短句和长句，便于与一致性错误句对照。同时，正常句又作为实验中

的填充句，其数量多于一致性错误句。每个实验版本中均有10个正常短句材料和10个正常长句材料。前者与一致性短句长度相当，同样为简单过去时或过去进行时的简单短句[如句(7)所示]。后者由连词and连接的两个意义连贯的简单短句组成[如句(8)所示]。

(7) She sang a sweet song. (正常短句)

(8) The speech was very good and people clapped their hands. (正常长句)

3.3 实验流程

被试首先阅读实验说明和任务描述，通过4个练习题的操作熟悉实验任务和操作流程，再进入正式的实验任务。完成实验后提交个人信息，至此实验完毕。实验说明里告知被试有权随时退出实验。实验任务描述中告知被试将阅读若干英语句子，凭第一直觉为这些句子的可接受度在0(绝不可接受)到5(完全可接受)的范围内打分。正式实验任务与练习中的所有刺激材料都在屏幕正中以单个方式呈现，打分选项在其下方。被试需在材料刺激呈现的30秒内通过鼠标确认打分，并进入到下一句子。任何时候，被试都无法返回之前的任何页面修改打分。本实验总耗时为10-15分钟。实验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以问卷形式发放，实验材料均在问卷页面中呈现。母语者组与高阶学习者组的实验步骤完全一致。

4 数据分析

针对研究问题一，我们首先分析了母语者组和高阶学习者组对零形回指(包括主零、宾零)与非零形回指(包括主非、宾非)两种情形下句子类别的接受度，以考察高阶学习者对句法形式完备的掌握。两组被试的接受度平均值与标准差见表1。

表1 母语者组与高阶学习者组对零形回指和非零形回指英语句的接受度平均值及标准差(括号为标准差)

	主零	宾零	主非	宾非
母语者组 (N=32)	2.19 (1.21)	2.18 (1.20)	3.62 (0.83)	3.86 (0.94)
高阶学习者组 (N=30)	1.10 (0.99)	0.98 (1.00)	3.33 (1.30)	3.62 (1.18)

以回指形式(零形、非零形)和回指对象先行语情形(主语、宾语)为组内因素、两个被试组别(母语者组、高阶学习者组)为组间因素的“ $2 \times 2 \times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Measure ANOVA)显示,回指形式具有显著主效应 [$F(1, 60) = 193.15, p < .001$],先行语情形有边缘显著主效应 [$F(1, 60) = 3.21, p = .078$],被试组别具有显著主效应 [$F(1, 60) = 10.18, p = .002$]。回指形式与先行语情形具有显著交互效应 [$F(1, 60) = 7.56, p = .008$],回指形式与被试组别之间也具有显著交互效应 [$F(1, 60) = 9.28, p = .004$],先行语情形与被试组别则无交互效应 [$F(1, 60) = 0.11, p = .74$]。以上三个因素之间并无三重交互效应 [$F(1, 60) = 0.42, p = .52$]。

为进一步审视两个被试组别各自的情况,我们对其分别进行了以回指形式和回指对象先

行语情形为组内因素的“ 2×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母语者组的分析结果显示,回指形式具有显著主效应 [$F(1, 31) = 60.25, p < .001$],回指对象先行语情形并无显著主效应 [$F(1, 31) = 2.83, p = .10$],两个因素之间也无显著交叉效应 [$F(1, 31) = 2.74, p = .11$]。对高阶学习者组的分析结果显示,回指形式具有显著主效应 [$F(1, 29) = 140.56, p < .001$],回指对象先行语情形并无显著主效应 [$F(1, 29) = 0.87, p = .36$],但两个因素之间有显著交叉效应 [$F(1, 29) = 4.73, p = .038$]。

对于研究问题一中关于高阶学习者对一致性本身的习得,本文分析了两个被试组别对正常句(正常短句、正常长句)和一致性错误句(一致性错误短句、一致性错误长句)两种情形实验句的接受度情况,两个被试组别的接受度平均值及方差见表2。

表2 母语者组与高阶学习者组对一致性错误句和正常句的接受度平均值及标准差(括号内为标准差)

	正常短句	正常长句	一致性错误短句	一致性错误长句
母语者组 (N=32)	4.63 (0.50)	4.17 (0.62)	1.17 (0.96)	1.67 (1.08)
高阶学习者组 (N=30)	4.54 (0.89)	4.08 (0.76)	0.81 (0.83)	1.26 (0.86)

以一致性情形和句子长度为组内因素、两个被试组别为组间因素的“ $2 \times 2 \times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一致性情形 [$F(1, 60) = 549.77, p < .001$]具有显著主效应,句子长度无主效应 [$F(1, 60) = 0.014, p = .91$],组别具有边缘显著效应 [$F(1, 60) = 3.18, p = .079$]。一致性情形与句子长度之间具有显著交互效应 [$F(1, 60) = 43.88, p = .001$],一致性情形与被试组别之间无交互效应 [$F(1, 60) = 1.24, p = .27$],句子长度与被试组别之间也无交互效应 [$F(1, 60) = 0.03, p = .86$]。以上三个因素之间无三重交叉效应 [$F(1, 60) = 0.05, p = .82$]。

为进一步检视两个被试组的各自情况,以一致性情形和句子长度为组内因素对两组各进行“ 2×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母语者组的分析结果显示,一致性情形具有显著主效应 [$F(1, 31) = 217.77, p < .001$],句子

长度并无显著主效应 [$F(1, 31) = 0.05, p = .83$],两个因素之间具有显著交叉效应 [$F(1, 31) = 27.16, p < .001$]。对高阶学习者组的分析结果显示,一致性情形具有显著主效应 [$F(1, 29) = 363.43, p < .001$],句子长度无主效应 [$F(1, 29) = 0.002, p = .966$],两个因素之间具有显著交叉效应 [$F(1, 29) = 17.78, p < .001$]。

针对研究问题二,即高阶学习者对线性思维特征的习得,本文考察了两个被试组别对零形回指和一致性错误两种条件下的接受度情形。通过计算被试的零形回指材料(包括主零与非零)接受度的算术平均值,得出“零形回指总体”一项,以体现零形回指句的总体接受度;同时,通过计算其一致性错误句(包括短句与长句)接受度的算术平均值,得出“一致性错误总体”一项,以体现对一致性错误句的总体接受度,如表3所示。

表 3 母语者组与高阶学习者组的零形回指总体与一致性错误总体及一致性错误短、长句的接受度平均值及标准差（括号内为标准差）

	零形回指总体	一致性错误总体	一致性错误短句	一致性错误长句
母语者组 (N=32)	2.18 (1.16)	1.42 (0.91)	1.17 (0.96)	1.67 (1.08)
高阶学习者组 (N=30)	1.04 (0.94)	1.04 (0.69)	0.81 (0.83)	1.26 (0.86)

以这两个条件（零形回指总体、一致性错误总体）为组内因素、两个被试组别为组间因素的“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组内因素 $[F(1, 60) = 6.54, p=.013]$ 和组间因素 $[F(1, 60) = 6.55, p=.013]$ 都具有主效应两因素之间具有显著交互效应 $[F(1, 60) = 16.44, p<.001]$ 。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一交互效应在一致性错误短句 $[F(1, 60) = 5.51, p=.02]$ 和长句 $[F(1, 60) = 5.79, p=.02]$ 条件下都能成立。

5 讨论

如上所言，研究问题一旨在审视高阶学习者在句法规则层面对形式完备和谓语动词一致性的习得。对回指材料的分析结果显示，回指形式与被试组别之间具有显著交互效应，而高阶学习者对零形与非零形回指的区别度比母语者更加敏感，即高阶学习者较母语者反而更倾向于非零形回指。因非零形回指显然更具明确的回指形式，所以这一结果同文献中关于二语学习者在回指形式上存在过度明确的现象一致。由于高阶学习者在回指形式上的表现不亚于母语组，这无疑显示了其最终状态中介语语法在规则层面能成功习得形式完备。需指出的是，这与王文斌、陶衍（2020）所发现的中阶学习者表现完全不同：中阶学习者因受母语强空间性思维的制约，尚未完全习得规则层面的形式完备。因此，高、中阶学习者在规则层面习得的这种表象差异，实则昭示了其中介语在思维层面的不同。显然，高阶学习者在其最终状态中介语中能有效压制其原有的母语强空间性思维，顺利习得了规则层面的形式完备，甚至还可能将这种压制绝对化，对回指形式比母语者更为敏感。

然而，在此需追问的是，这是否意味着

其最终状态中介语在这种对母语思维的压制下已完全消除汉语影响的痕迹？其实，在高阶学习者组中可观察到先行语位置与回指形式的显著交叉效应：在零形回指条件下，高阶学习者组对主语先行语的接受度更高，而在非零形回指条件下，他们对宾语先行语的接受度更高。可见对高阶学习者而言，主语的可及性高于宾语，而这符合汉语零形回指中回指对象先行语可及性排序（蒋平，2003；王文斌、陶衍，2019b），然而在母语者组中却并无这一现象。由此可见，高阶学习者的最终状态中介语中母语的强空间性思维虽受压制，但母语汉语在零形回指时的先行语可及性排序却依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对一致性错误句和正常句的分析结果显示，句子长度和一致性均无与组别的交互效应，而对两组被试的分别分析显示，两组都显示出一致性主效应及其与句子长度的交叉效应。这表明，高阶学习者组对一致性错误的敏感度与母语者相当，因此可认为其在句法规则层面已掌握谓语动词一致性本身。这似乎与Jiang（2004，2007）所发现的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对一致性在线加工上不敏感的现象有所不同。一方面，若实验任务允许学习者给予英语句法知识充足的注意力（如本实验任务情形），被试在规则层面对一致性具有不亚于母语者的表现；另一方面，若实验任务不直接考察句法知识本身而被试又未对句法给予足够注意力[如Jiang（2004）要求被试快速判断语义]，学习者在在线加工上就并未表现出对一致性的敏感。这种看似不同的现象其实并不矛盾，而恰恰能揭示高阶学习者句法知识的复杂性：在规则层面掌握句法知识本身，但在在线加工时，却不能“自然”地触发这种规则。

事实上，这种复杂性表现的背后涉及更深层的思维层面。可以看到，就研究问题一所关

注的规则层面的习得而言,学习者对于形式完备和谓语动词一致性都可成功掌握,但这是否足以说明高阶学习者在思维层面已习得线性思维特征?这恰是研究问题二的关注点。

对于研究问题二,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对零形回指和一致性错误这两种英语句法错误的接受度表现出明显差异,这足以说明其对这两种错误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对于母语者,一致性错误比零形回指更不能接受,这与王文斌、陶衍(2019a)的发现如出一辙。可以认为,这是母语者线性思维中谓语动词核心地位的重要体现。然而,在高阶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中,则是零形回指比谓语动词一致性错误更不可接受,说明其对形式完备的敏感度超过了谓语动词一致性,这与母语者的表现相反。可以看到,高阶学习者的最终状态中介语句法将形式完备的重要性置于谓语动词一致性之上,而这恰与上文所论述的谓语动词一致性在线性思维中的核心地位相违。可以认为,高阶学习者无法较深层次地习得线性思维特征。

有理由推测,高阶学习者最终状态中介语句法中对一致性的认识依然仅停滞于规则层面,难以深入到思维层面,因而未能领悟谓语动词一致性是线性思维特征的核心体现。由此可见,Jiang(2004,2007)所发现的,高阶学习者难以在在线加工中“自然”触发其句法中的一致性规则,这有着思维层面的缘由:正因其难以习得线性思维特征,高阶学习者仅能在注意力等条件允许时才将一致性当作规约性的句法规则加以应对,却在注意力等受限的在线加工条件中难以让思维层面“自然”触发一致性的句法知识。

从上文分析可看出,高阶学习者可在规则层面习得形式完备和一致性本身,并能在此过程中压制母语的强空间性思维。然而,其最终状态中介语在思维层面却难以习得强时间性线性思维。事实上,有近期研究发现,学习者对运动事件的加工也明显异于母语者(张拥政、于翠红,2018),由于运动和动作与时间性思维相关,因此这也同样反映出学习者难以掌握强时间性思维,与本实验的结果不谋而合。其实,这些发现还需进一步综合思考,以探求二语习得在思维层面的一般规律。

从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习得行为可看出,学习者的最终状态中介语思维既非母语汉语的强空间性思维特质,也非完全的目标语英语的强时间性思维特质,而是表现出新的

特征。首先,这种中介语在思维层面体现了对于线性思维特征的一种浅层习得:高阶学习者能习得规则层面的语言表象,但未能更深的思维层面习得思维本身,呈现出得其皮毛而不能得其精髓的现象。其次,最终状态中介语思维既体现了对于母语汉语的强空间性思维的压制,也体现了母语汉语的其他痕迹(如零形回指中先行词的可及性排序与汉语一致),表现出一种既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标语的“自成一套”的特点。

可以推测,这两个特点可能反映了最终状态中介语在思维层面所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性,即对于深层的目标语思维习惯难以习得,以及其最终状态中介语呈现出一种“自成一套”的杂糅特点。事实上,这两个特点与目前的二语习得理论也可相互参照。一方面,对句法特征的可习得性研究是大部分二语习得理论共同关注的话题。当然,本文并未局限于句法规则层面,而是触及思维层面并着重考察思维特征的可习得性。另一方面,思维层面这一最终状态中介语“自成一套”的现象与二语习得理论一些研究者的主张互相呼应(如duPlessis et al., 1987; Martohardjono & Gair, 1993; Schwartz & Sprouse, 1994; White, 2003等),即二语中介语不应视为一种不完全的目标语,而应视为一种较独立的、既不同于母语也不同于目标语的独特语言体系,并获得相应的独立研究地位。

最后需指出的是,虽然强空间性思维和强时间性思维分别是汉语和英语在思维层面的突出特质,但在本文,学习者对于一种思维的压制并不能使其完全习得另一种思维,这反映出强空间性思维和强时间性思维并非两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思维。

6 结论

二语习得必然伴随中介语在思维层面的发展,然而,大多二语习得研究仅停留于句法规则层面,尚未深入到思维层面。因此,本文力图超越规则层面,旨在探索二语习得在思维层面的最终结果,即高阶学习者的最终状态中介语对于目标语思维特征的习得。就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实验手段,在规则层面和思维层面对以汉语为母语的高阶英语学习者进行了并案考察,并通过其与英语母语者的对比,探究了高阶学习者对英语线性思维的习得。本文发现,

高阶学习者可以在规则层面习得形式完备和谓
语动词一致性本身,同时能压制母语的强空间
性思维,但仍未能在思维层面习得线性思维习
惯。这表明学习者往往难以习得深层次的目标
语思维特征,而其最终状态中介语在思维层面
则具有其自身特征的独特性。需指出的是,本
文关于高阶学习者的发现与之前研究关于中阶
学习者的发现有迥异之处,而这兴许能反映中
介语在思维层面发展的常规脉络。□

注释

- ①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汉时空性特质差异与英汉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编号:18AYY003)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的支持。
- ② 最终状态中介语一般是指非母语习得(如二语习得)中,学习者通过学习达到了最终水平时其中介语语法的状态。
- ③ 理论上认为,已达到了近似母语(near-native)水平的高阶学习者可视为拥有最终状态中介语。就我国的英语学习者而言,英语专业学生在通过相关的专业检测之后一般可视为高阶学习者人群。
- ④ 如特征集合假说(Feature-Assembly Hypothesis)(Lardiere, 2008)提出,母语与目标语因词汇的语法特征不同而需在习得过程中重新调整;可解性假说(Interpretability Hypothesis)(Tsimpli & Mastropavlou, 2007)基于句法理论认为,目标语中的不可解特征(uninterpretable features)难以习得;界面假说(Interface Hypothesis)(Sorace & Filiaci, 2006)认为,高阶水平学习者所表现出的问题往往源自语法与其他界面。事实上,二语习得理论繁多,在此仅列举若干有代表性者,旨在说明以往研究未曾关注思维层面。关于主流二语习得理论的脉络梳理,可参见White(2012)。
- ⑤ 在王文斌、陶衍(2020)的研究中,中阶学习者连对于规则本身都难以完全掌握,故无从谈起其对强时间性思维本身的习得。

参考文献

- [1] duPlessis, J., Solin, D., Travis, L. & White, L. UG or not UG, that is the question: A reply to Clahsen and Muysken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987 (3): 56-75.

- [2] Gullberg, M. Handling discourse: Gestures, reference tracking,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early L2 [J]. *Language Learning*, 2006 (1): 155-196.
- [3] Hendriks, H. Using nouns for reference maintenance: A seeming contradiction in L2 discourse [A]. In Ramat, A. G. (ed). *Typ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Berlin, Germany: Mouton de Gruyter, 2003: 291-326.
- [4] Humboldt, W. *On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5] Jiang, N. Morphological insensitivity in second language processing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004 (4): 603-634.
- [6] Jiang, N. Selective integra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 *Language Learning*, 2007 (1): 1-33.
- [7] Lardiere, D. Feature-assembl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In Liceras, J., Goodluck, H. & Zobl, H. (eds). *The Role of Formal Featur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2008: 107-140.
- [8] Martohardjono, G. & Gair, J. Apparent UG inaccessibilit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isapplied principles or principled misapplications? [A]. In Eckman, F. (ed). *Confluence: Linguistics, L2 Acquisition and Speech Pathology*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79-103.
- [9] Ryan, J. Overexplicit referent tracking in L2 English: Strategy, avoidance, or myth? [J]. *Language Learning*, 2015 (4): 824-859.
- [10] Schwartz, B. & Sprouse, R. Word order and nominative case in nonnative language acquisi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L1 Turkish) German interlanguage [A]. In Hoekstra, T. & Schwartz, B.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4: 317-368.
- [11] Sorace, A. & Filiaci, F. Anaphora resolution in near-native speakers of Italian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6: 339-368.
- [12] Tomlin, R. S. Functionalism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0 (2): 155-177.
- [13] Tsimpli, I.-M. & Dimitrakopoulou, M. The

- interpretability hypothesis: Evidence from wh-interrogativ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7 (23): 215-242.
- [14] White, L. On the nature of interlanguage representation: Universal Grammar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 In Doughty, C. J. & Long, M. H. (eds).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Hoboken,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18-42.
- [15] White, L. Universal Grammar,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Language Teaching*, 2012 (3): 309-328.
- [16] Wierzbicka, A. Ethno-syntax and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J]. *Studies in Language*, 1979 (3): 313-383.
- [17] 陈平. 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 [J]. 中国语文, 1987 (5): 363-378.
- [18] 何清强, 王文斌. 时间性特质与空间性特质: 英汉语言与文字关系探析 [J]. 中国外语, 2015 (3): 42-49.
- [19] 蒋平. 影响先行语可及性的因素 [J]. 外国语, 2003 (5): 43-50.
- [20] 蒋平. 零形回指现象考察 [J]. 汉语学习, 2004 (3): 23-28.
- [21] 蒋平. 汉语零形回指先行语的句法可及性等级序列 [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 135-140.
- [22] 王墨希, 李津. 中国学生英语语篇思维模式调查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4): 59-64.
- [23] 王文斌.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a (2): 163-73.
- [24] 王文斌. 论英汉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时空性——从Humboldt的“内蕴语言形式”观谈起 [J]. 中国外语, 2013b (3): 29-36.
- [25]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26] 王文斌, 陶衍. 英语时间性思维特质影响其语言加工的实证研究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a (5): 89-99.
- [27] 王文斌, 陶衍. 汉语先行语句法成分对零形回指解析加工策略之影响 [J]. 外语教学, 2019b (5): 1-7.
- [28] 王文斌, 陶衍. 英汉时空性思维差异影响中阶英语学习者的实证研究: 以对回指形式和一致性的习得为例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0 (3): 1-9.
- [29] 许余龙. 话题引入与语篇回指——一项基于民间故事语料的英汉对比研究 [J]. 外语教学, 2007 (6): 1-5.
- [30] 张拥政, 于翠红. 中国学习者运动事件在线加工中的编码效应 [J]. 中国外语, 2018 (6): 66-72.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the Linear Thinking Pattern by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pro-temporal and Chinese pro-spatial thinking traits, employed experimental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at both the syntactical rule level and the thinking pattern level with a focus on their acquisition of the English linear thinking pattern. It aims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the thinking patterns exhibited by the end-state interlanguage of SLA.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at the syntactical rule level advanced learners could suppress the native pro-spatial thinking trait and successfully acquire formal completeness and subject-verb agreement which embody linear thinking pattern. However, they could not acquire the linear thinking pattern itself.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ven advanced English learners could not acquire the thinking pattern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sulting in an end-state interlanguage that demonstrates a thinking pattern of its own. The present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such features may reveal a general pattern of SLA at the thinking pattern level.

Keywords: pro-spatial and pro-temporal thinking traits; linear thinking pattern; acquisition of anaphora; acquisition of agreements; end-state interlanguage